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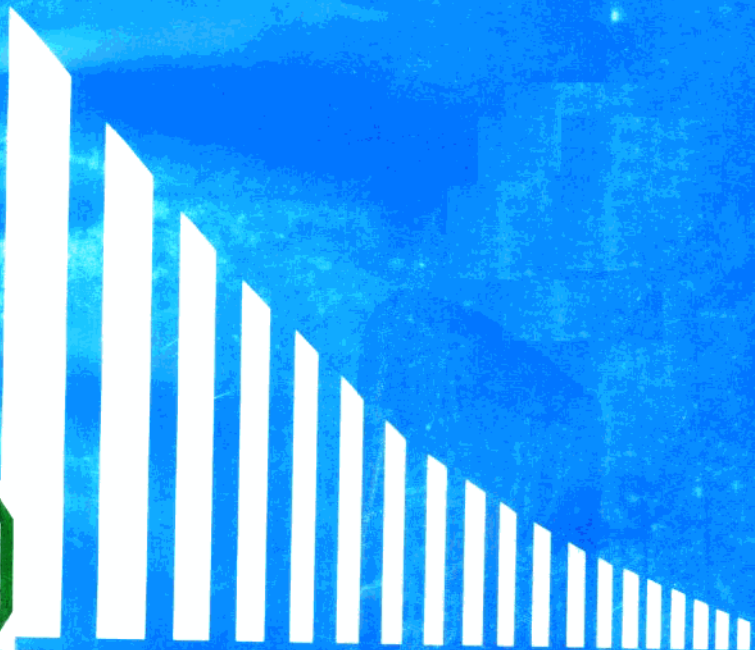


中文教育书系

外国文学专题

——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

李云峰 苏永旭 王文平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序

李明滨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年前,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 95(北京)年会提出“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已经显出初步的成效。

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历来争论较大。我国从 50 年代以来,曾经编写过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史,有按文艺思潮的发展更替讲史的,即“以论带史”;有按作家作品出现的次序演绎的“编年史”;也有按文学的体裁,即小说、诗歌、戏剧类别归并写史的等等。何种为佳,本来就无定论。这方面的情况就不如中国文学史那样有定规。虽然在中国文学界也有“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但那多是在现代文学,而在古典文学上,向来是遵循“分期看朝代,分类按体裁”。如有“唐代”、“宋代”和“元代”文学之称,而且分别突出诗、词、曲各不相同的体裁为重点,这种规范流传了多少年,已经为大家所习惯,也就不大有人去改变。

而对外国文学史重构的意见论争,却可以理出三个层次来。一是对现有的文学史书作出回顾、评价和总结,似有“现身说法”的作用。二是阐述必须重写的理由、理论,或者反之,甚至引入外国的文学观念用以作理论根据。三是对如何重写做各种设想和探讨。主张和反对重写这两个方面的学人都各有理由。不过,不同时期出版的文学史,由于作者的方法和观点,以及当时流行的体例

和类型互不相同,因而必然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杨周翰、吴达元、赵罗蕤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卷)算是 50 年代以来出现的第一部“部颁教科书”,具有权威性,发生过全国性的影响。该书有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历史的系统性。过去的史书(包括编撰和翻译的)一般详希腊而略罗马,详文艺复兴而略中世纪,详 19 世纪而略以前各个时期;该书已照顾到历史的系统性,依次叙写古代文学、中古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 世纪文学、18 世纪文学和 19 世纪文学,各个时期都写到,并且各占有恰当的比例。纵的方面:历史脉络贯串始终。横的方面:每章均先有概论,次有各主要国家文学概论,再次论述代表作家和作品,条理分明。该书的体例和写法,几乎还成范例,是我国后来同类书籍的模式。其二是叙述的科学性。遵循外国历史学传统的“信史”和“实录”。同时力避片面性,“不虚美,不隐恶”,对作家和作品持分析的态度,尤其是创作中存在矛盾和复杂情况的作家。此外,选材上力求客观,不以主观的好恶而决定取舍。这样做,必然是“文非泛论,按实而书”,达到翔实可信,合乎科学。其三为大容量和知识性强,两千多年的欧洲文学,仅用 50 万字的篇幅就加以概括,而且涉及作家 537 人,作品 1252 部,评述各种创作方法,文学体裁、艺术手法和艺术经验,语言的精炼自不必说了。是故内行人仍不得不承认它是一部详史。

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当年的一部时代的代表作。如今,不但时代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也有了大变化,就是作者们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也已有所不同,所以由主编单位酝酿,拟定出了另写《新编欧洲文学史》并予以实施的计划。可见最好的教材也不可能万古不变。

稍后出现的另一部高校文科通用教材——朱维之、赵澧先生主编的部颁教科书《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应该说也有其特色。它虽然沿用了《欧洲文学史》的框架和体例,但已有创新。主要是

更好地解决了点和面结合的问题。它既显示了历史的连续性与丰富性,给人以全面的概貌,又不致成为作家作品的罗列堆砌。办法是着重对古今有代表性的欧美 53 位大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做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评论。这就可以避免给人以一片混沌之感。因为论文学时代毕竟当以大作家为标志,以最优秀的名著为旗帜。该书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作品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二者兼顾和兼备的问题,去除了历来重前者而轻后者的弊病。它应该说是《欧洲文学史》之后的另一部适用教材。

但是,即便如此,该书(连同它的前身《外国文学简编》)也在随形势发展作不断的修改,最明显的是补写了 20 世纪的当代文学,在观念上也作了若干调整。

至于名著重读的事实,则是早已有之。一般说来,经典是比较稳定的,一部名著之所以能被经典化,总是经过时间的筛选,经受不止一个时代的考验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或多数人公认。因而它还是比较固定,其成就在文学史上属于有定评,不致于在评价上发生太大的起落,哪怕是某个时期内曾遭受误解、贬抑或批判,但时间终究会拭去其身上的蒙尘,展现其本来的面目和价值。此外,名著虽然可以经典化,但经典却是可以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读,因而名著常常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甚至日益闪现其光辉,让人认识其新的价值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名著重读都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也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苏永旭和李云峰、王文平一起主编的这本《外国文学专题——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正是在世纪之交、面临转折时期的一种尝试,我把它看作是对“95 北京年会”的响应。这不仅因为他当时正在北大做访问学者,出席并参与了“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的讨论,而且由于本书的内容已有体现,并显出了新的气息和风貌。

本书虽然是一本专题书,不是系统的文学史,但已照顾到各个文学时代的重大内容。依次有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17 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18 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随后的浪漫主义文学和 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20 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文学。这样按时代和文学思潮结合作分章的体例,很好照顾到了面上的完整性,教学上十分便捷实用。至于名著重读,本书选择的重点作家和作品少而精,总共 27 人,均属于历代文学史上最有个性的作家。且又是从外国文学精神的角度切入考察的,也颇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另外书中还特别加重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诸流派的介绍。这不但是当前教学的难点,而且是研究领域比较少人涉足而又是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内容。一般的文学史书都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混为一谈,且上面提到的《欧洲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也未能幸免,而在这本学术著作中却做了很好的区分,并对“后现代主义文学”设专章介绍,这自然是该书最大的难能可贵之处。凡此种种都很好表现了作者们的学术功力和教学经验。

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要求人们对文学史书不断更新,对文学名著不断重新解读,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世纪的到来,必将有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书、新的文学专题著作推出。作为一次成功的尝试,我祝愿《外国文学专题——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一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获得全社会广泛的承认和肯定。

1999.3 月 北京大学

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

(代前言)

苏永旭

《外国文学专题——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问世了。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把它看作是对1995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主题“文本重读与文学史重构”的响应,应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文本重读”是“文学史重构”的基础,也是“外国文学精神重塑”的基础。没有文本重读,新的有分量的文学史便无以问世,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力就会枯竭,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也便无以产生。“文本重读”与“文学史重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勿容回避的严峻的学术挑战。这中自然充满了激流和险滩,高山和峻岭乃至戈壁和大漠。有时可能会左右逢源,汪洋恣肆,有时也可能泉水叮咚,踪影莫辨。自然也吸引来了很多人进行学术探险。1995 年4 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这次盛会就为人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当时正值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第二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自然不能错过。开幕式上季羨林先生以此为题做了精采的学术讲演,在座的学者无不为之倾倒。会议上代表们踊跃发言,唇枪舌剑的此情此景,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原本不打算发言的,由于受这种氛围的感染,禁不住也把采用比较文学的学术体例编制的《〈比较戏剧史论〉的理论构架》复印了数十份在代表中散发,进行交流。会后受这次会议的启发,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还完成

了两篇题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的建构和操作》和《社会文化背景笼罩下的作家心态史、母题发展史、文体演变史和读者接受史的有机统一——也谈文学史重构》的长篇论文。而这本题为《外国文学专题——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的学术专著便是在“文学史重构”方面所做的一个初步的尝试。我当然更是时刻盼望着这两篇长篇论文中所做的构想和设计的尽快的好梦成真。

“文本重读与外国文学精神重塑”这个角度的选择是与我一向所持的“文学是美的人学”的文学观密不可分的。文学作为美的人学历来都是为了完善人们的人性而存在的,它的根本使命历来都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形态的基本主题无不是为了怎样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为什么我说“文学是美的人学”呢?主要依据主要有这样三点:第一、文学写的是人,写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富于诗意的社会生活,是“神”在人的心灵中点燃的美丽的人性的火光。第二、文学创作本身作为一种美的创造为的是人——文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精神痛苦。第三、文学通过美的方式探索、解决的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无法很好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和生命困惑,也是为了人。它从不表现政治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现存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早已解决或能够解决的问题,它要表现的重心往往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都无法很好解决的“出位之思”,往往是带有永恒意味的生与死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美与丑的问题、爱与恨的问题、罪与罚的问题,同时也是任何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杰出的政党、卓越的政府都只能部分解决而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从这样一种文学观出发,使我考虑到了对优秀的外国文学传统进行“人性”开掘的题目。于是对过去大家较为忽略的“外国文学精神”的开掘与重塑就成为该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并试图对外国文学传统中优秀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价值观有所发现和突破。

人类 5000 年来血战前行的历史,是美的创造的历史,也是人性本身不断得到完善和跃升的历史。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要经历和朝着“自然性的人”、“社会性的人”、“精神性的人”和“审美性的人”四个阶段不断发展与挺进。“自然性的人”的阶段是人性发展的初级阶段,大体包括了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以前的初民时代。“社会性的人”的阶段作为人性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大体包括了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至到我们今天。其根本性的标志即私有制的确立。尤其进入近代以后“社会性的人”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进入现代以后“社会性的人”的发展已出现了种种弊端,少部分人已开始较为充分的向“精神性的人”过渡。在现代以前的诸个阶段里偶有“精神性”取向的社会的杰出人物出现,往往还被奉为“圣人”和社会的精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阶段充其量还处于“社会性的人”向“精神性的人”的过渡时期,真正的“精神性的人”的实现只有在人类的吃喝住穿问题得到充分的彻底解决以后。其根本性的标志就在于公有制的全面确立。至于“审美性的人”的阶段的到来,恐怕也只有在“精神性的人”有了漫长的充分的发展之后才有可能(也许要经历好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审美性的人”的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人性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完善,大概也就是共产主义时代的真正到来。如果说“自然性的人”主要追求的是自身的种的延续和对自然的适应,“社会性的人”着重强调的是对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追求,“精神性的人”着重追求的是对社会的精神需求的话,那么“审美性的人”阶段的到来则意味着对纯粹的精神生活的全面追求。我们讲“社会性的人”着重追求社会的物质财富,决不意味着他们对精神生活就不追求了。我们讲“精神的人”着重追求精神财富,也决不意味着他们对物质生活就不追求了,只是退居到了第二位而已。至于“社会性的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所掌握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他的基本的吃喝住穿问题解决的程度。人类 5000 年来的

文明史,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类自身的成长史。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对人物的塑造,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大概也不过是对相应阶段的“自然性的人”、“社会性的人”、“精神性的人”(过渡期的)“审美性的人”(某些因素意义上的)的反复去的美的描绘和艺术重塑。

原始社会的文学乃至比原始社会更古老的文学,塑造的艺术形象就脱不出对“自然性的人”的刻画和描绘。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塑造的一切人物形象和艺术形象自然也脱不出对“社会性的人”的美的发现和重塑。奴隶社会的文学初步反映和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这中存在的大量的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和巫术的痕迹则保留了“自然性的人”的观念残余。这一点在印度的吠陀经典、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都有所体现。而基督教神学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人对神灵的过分依赖,对自身力量和智慧的过分不信任,则是“自然性的人”价值观念的历史反弹。如果说巫术中的“自然性的人”通过狂妄的主观意念适应自然而生存,那么中世纪打有浓郁的“自然性的人”烙印的“社会性的人”则是对基督教神学所代表的最高自然的全面投降。因此“社会性的人”品类的艺术形象才是外国文学精神开掘的重心。其次才是初民时代“自然性的人”的文学中透露出的“社会性的人”的美的曙光。另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的人”向“精神性的人”的过渡也是我们考察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文学中浓郁地带有“精神性的人”色彩和指向的“社会性的人”即“社会主义新人”的探索自然也不能忽视。我们这里所说的外国文学精神主要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对人的命运的关心,是一种对人生困惑的排除,是一种对人的疑难问题的美的解决,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充分维护,是一种对人性的充分张扬,是一种对幸福的执着追求,是一种对生命和谐的艺术探险,是一种对人类未来出路的上下求索,是一种对人类的精神

痛苦的无畏减轻,是一种对人类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所做的美的引导……

荷马史诗体现出来的“伊利昂纪精神”是对民族主义的弘扬,也是对英雄主义的讴歌;是对集体主义的推崇,也是对丑恶的个人主义的贬斥。它所表现出来的“俄底修斯精神”则是对征服自然的伟大的人类精神的一曲美的凯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古希腊名剧更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抗争。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千年来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扼杀,在但丁的《神曲》里才开始再次透露出人文主义的曙光。《神曲》里,但丁通过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梦游,通过对人们社会行为和思想行为上诸种恶德败行的抨击和抛弃,不仅为当时的意大利指出了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而且也为人类自身怎样走向幸福开辟了途径。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人们只要注意不断克服自己思想行为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诸种罪恶,加强自我修养,靠着自身崇高的理性和智慧的指引,同样可以走向精神的天国。这中表现的这种伟大的神曲精神,渗透着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色彩,它对人性的张扬,对神性的抑制,不仅达到了人文主义的高度,而且也达到了全人类性的高度。它的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但丁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巨人传》中体现的“巨人精神”,以对人类自身的力量和智慧的歌颂为指归,把“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作为庞大固埃父子寻求的神瓶上面的三句题辞,揭示了“社会性的人”非常尊贵的一个重要方面。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中所表现出的堂·吉珂德精神,对狂热地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同样揭示了伟大的人类精神的又一个重要侧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所表现出的哈姆雷特精神,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执着兑现,宁可毁灭也决不向恶势力妥协的可贵的品格,再次集中体现了伟大的人类精神闪光的一面。17世纪的莫里哀的喜剧创作一反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充满着强烈的人民性和卓越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对下

层人民智慧的颂扬和同情,使他达到了同时代作家都无法达到的高度。艺术上他对类型化人物的创造性改造,使他轻易塑造出了象哈姆雷特一样杰出的文学典型答尔丢夫。莎士比亚的成功塑造靠的是充分的个性化和丰富复杂化,莫里哀的成功靠的则是对类型化典型的充分的立体化及其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类型的简单化和平面化的摒弃和超越。启蒙主义时期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轻易再现了《俄底修斯纪》的征服自然的主题,只是这中又多了一层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和蓬勃向上。歌德的《浮士德》经过对文艺复兴 300 年来欧洲资产阶级精神探索史的总结,发现“只有每天每日不断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做生活和自由的享受”。在作品的结尾处,众天使抢在魔鬼靡非斯特之前把浮士德的灵魂带往空中冉冉升起时,嘴里还不停地唱着这样一首美丽的歌曲:“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一下子便轻易揭示出了浮士德精神的核心实质:不知满足,自强不息!这是否也体现了伟大的人类精神的又一个侧面呢?应该说是的。而且《浮士德》的最后一句诗“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既显示了歌德对女性的美的礼赞,同时也表现了他对社会创造力智慧源泉的深层思考!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对“社会性的人”的塑造,主要侧重表现了他们对黑暗的资产阶级现实的主观的精神对抗。拜伦、雪莱、雨果,无不如此。他们塑造的“理想环境中的理想人物”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 世纪中后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对丑恶的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对下层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但他们在政治上并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充其量仅是一种改良主义。“社会性的人”发展到这一阶段则主要体现为于连、拉斯蒂涅等个人主义英雄对社会的对抗。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等人自然也没能脱出巢臼。只有托尔斯泰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他不仅深深地意识到了“社会性的人”不择手段追求物质财富的弊端,而且也认识到了俄

罗斯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罪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应该象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不能买卖。可见他是反对私有制的。因此只要私有制不消除，“社会性的人”向“精神性的人”彻底跃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继之而起的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是建立在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应该说对这个问题是该有一个真正的解决了。而且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导下，在“精神性的人”的塑造方面确实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而且还部分地取得了成功。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利，《日瓦戈医生》中的男主人公都部分地达到了“精神性的人”的高度。然而由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都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何况长期以来又闭关锁国，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关于在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开放的社会主义”的论述，社会物质生产长期滞后，人们的社会物质需要都不能充分的很好的满足，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怎能真正成功地塑造出完全是“精神性的人”的文学典型呢？一方面他们固然都有崇高的精神品格，但他们在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时往往又都是物质主义的。因此苏联文学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文学中塑造的艺术形象，基本上仍脱不出“社会性的人”的樊篱。再加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有所顾忌的现实主义又直接影响了苏联现实深层本质的把握，粉饰现实的创作倾向使很多作品无法达到真理的高度。1991年前后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很多作家便打着“文学私有化”的旗帜，迫不及待地汇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洪流。这既是教训，也是启示。既然如此，无所顾忌的现实主义是否就一定能够给我国带来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繁荣呢？回答是否定的。且不说这样一种理论主张严重违背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而且还会直接危及到党的领导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大局。

如果政权都不存在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繁荣还从何谈起呢?彻底的无所顾忌的现实主义固然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一切创作方法中至高无上的艺术方法,是古今中外一切文学成功的最大奥秘所在,实际上它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100%地真正兑现过。因为任何一个作家往往都是处于一定阶级、一定民族、一定时代的,他在创作时不可避免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任何一种文学成功都仅只体现为“无所顾忌”的程度怎样。某种意义上它主要还是一种文学理想。只要阶级还存在,阶级利益还存在,这种彻底的无所顾忌的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实。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一味地鼓吹对社会现实主义现实的无原则的歌德和全面的有所顾忌呢?决不是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应该是:“尽可能地无所顾忌”是可取的,“全部的无所顾忌”是不足取的,而且还必须是要坚决反对的;“必须要有所顾忌”是可取的,“全部的有所顾忌”是不足取的,而且还必须是要坚决反对的。所谓“尽可能地无所顾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的各种各样严重的社会弊端的基础之上的,对某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和某些依附在健康的社会主义肌体上的毒瘤,就是要“无所顾忌”地抨击和切除,就是要真实客观。所谓“必须要有所顾忌”,就是要对某些危及党的领导和政权的问题噤若寒蝉。某种意义上说,“必须要有所顾忌”就是“尽可能地无所顾忌”的重要前提。也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才能同作家的创作自由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不断推向新的高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断健全,人们所享受的民主权利的不断增多,作家享受的创作自由也将愈益充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将愈益充满生机。目前我国现阶段的文学对人物的刻划自然也处于“社会性的人”的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基础的不断增强,人们社会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精神性的人”也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刻意追求的美的目标。实际上在部分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也确实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对文学典型的塑造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同。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主要经历和表现了“社会性的人”观念的全面崩溃和解体,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主要表现了对“精神性的人”价值观念的执着努力。当然它决不是“精神性的人”阶段的全面实现,充其量则是较多因素的由“社会性的人”向“精神性的人”的过渡时期。

现代主义文学所包括的诸多流派,除少数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外,大多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它不仅是对19世纪末以来高度物质主义的西方社会的反思,更是对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切的痛苦的精神思考。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性的人”作为周围世界巧取豪夺、唯我独尊的征服者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上。“社会性的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在19世纪以前还算正常,对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度还较小。然而19世纪以后随着大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生产原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生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一方面造成了对自然的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个国家对销售市场的激烈争夺。开始时还算客气,后来干脆大打出手,演变为战争。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规模最大的两次。死亡之数之多,伤残人数之众,都在历史上罕见。这使满足于物质主义贪欲并耽于享乐的人们惊慌失措,方寸大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大家的心理承受力还勉强可以应付。经过数年的心理调整,“他人即天使”(见让·科克托《奥尔菲》)的观念又开始深入人心。然而一战结束后还不到20年就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一下子把人们推向了彻底的灾难的深渊。“他人即天使”的观念不见了,“他人即地狱”(见萨特《间隔》)的观念则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潮般涌动。值得人类庆幸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异化和对立,通过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和血流成河,最终毕竟走向了对战争观念的抛弃和埋葬。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社会性的人”价值观念的全面反思,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它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解体和重构,试图抛弃“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诸层关系的全面和谐。它们既不认为“他人是地狱”,也不认为“他人即天使”,他们鼓吹“主体间性”,向往人与人之间游刃有余的“场”的合作,重塑不可穿透的自我。这样一种“不可穿透的自我”试图以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和谐为核心,带有一种较强的和平主义色彩。把充分开掘每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的创造潜力,激励人们的创造热情,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崇高的历史使命。再不把“创造”作为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权。试图通过“创造平等”价值观念的确立,最大程度上激发社会创造力,推进社会进步。另外他们还否定了传统的“老子天下第一”的观念,消解至高无上的权威,推崇多元思维的价值建构,对于推进世界和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多元主义,要求为每一种文化都要留有相应的独立的发展空间,十分符合多极化的世界潮流。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出现的“元小说”、“超小说”、“中间小说”,后现代主义戏剧的三种基本的结构形式:非线性剧作、戏剧解构和反文法表演,无不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不确定性”的多元价值观所决定的。50年代后崛起的荒诞派戏剧、新小说、垮掉的一代文学、黑色幽默文学、愤怒的青年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结构现实主义文学也无不受到这条原则的制约。不容否认后现代主义文化带有一定的虚无主义色彩,这是它颠覆传统的绝对的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性的人”的价值观念必不可少的步骤和措施。但我们还必须承认后现代主义的这样一种虚无主义是一种含金量很高的虚无主义,决不是一种只讲“颠覆”和“摧毁”,不讲建设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它象传统的优秀的文学一样,同样充满着一种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而且就强度而言甚至还超越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

显然后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对“社会性的人”个人主义思维方式的反思具有明显的“精神性的人”的性质。但是可以说后现代主义阶段已经真正实现了“精神性的人”的整个要求呢？恐怕还不能这样讲。因为该阶段体现出来的某些特性仅只表现了他们对该方向执着的努力。更多的还只是一种理想，真正的成为现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其标志则是私有制的解体和公有制的全面建立。“社会性的人”是私有制的产物，其思想核心自然是个人主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全面异化和对立是其历史必然。后现代主义阶段是私有制的高级阶段，在这时出现“社会性的人”向“精神性的人”的过渡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尽管也建立了公有制，然而由于社会物质生产的相对滞后和经济的不发达，对“精神性的人”的追求还更多地处于方向的性质。“精神性的人”象“社会性的人”贯穿于私有制存在的始终一样，也将贯穿于公有制的始终。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随着人们社会物质生活最大程度上的满足，“精神性的人”所追求的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全面和谐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而“审美性的人”作为“精神性的人”的质的飞跃将贯穿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始终。

鉴于以上的观察角度，我们平时对文学的发展已经经历还需继续发展的“符合道德，违背人性”、“符合人性，违背道德”、“既符合人性，又符合道德”的三个阶段，大体上还都处于“社会性的人”发展的阶段。只有“既符合人性，又符合道德”的第三个阶段，才开始进入“精神性的人”的美的旅程。大概这就是新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的目标和方向，谁最早进入到这样一种境界，谁就将领导整个世界前进！“自然性的人”而“社会性的人”，而“精神性的人”各有侧重展现的“自然主义”、“物质主义”、“心灵主义”向“审美性的人”的阶段的日益靠拢，同时也为“外国文学精神”和“世界文学精神”的重塑廓清了迷雾和方向。21世纪优秀的世界文学的发展要

么是对第二个阶段的深化,要么是对第三个阶段的阔步迈进。如果说“现实主义”是“物质主义”的,“现代主义”是“心灵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是“精神主义”、“绿色主义”的,20世纪诸多的文学流派和思潮,诸如意识流、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乃至元小说、超小说、中间小说,无论其艺术形式多么复杂,它们永远都在叙说着“传统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遭遇和命运”,永远讲的都是“心灵主义”对“物质主义”的执着对抗和超越,那么21世纪世界新文学发展的基本主题将依然是“心灵主义”、“精神主义”对“物质主义”的颠覆、对抗和跃升,“精神性的人”也将依然成为全社会一切文学竞相重塑的方向和目标。